

海坨女儿

第 2 集

延庆县妇女联合会



目 录

前言	让美好心灵的鲜花开遍大地.....	(1)
一、	她的事业在田间.....	(3)
二、	农科战线一金花.....	(9)
三、	人民的好话务员——张淑琴.....	(17)
四、	家庭和睦幸福多.....	(25)
五、	久病床前有贤妻.....	(32)
六、	患难与共的好丈夫.....	(37)
七、	儿媳改嫁带公爹.....	(41)
八、	孝敬大爷公的好侄媳.....	(43)
九、	老人的幸福院，孩子的托儿所.....	(47)
十、	丈夫失去双臂之后.....	(54)
十一、	未婚夫严重烧伤后怎么办.....	(60)
十二、	正确对待婚姻爱情的孟玉平.....	(66)
十三、	塞外飞来“金凤凰”.....	(71)
十四、	要学“水莲”，不做“强英”.....	(74)
十五、	知错改错人人夸.....	(76)
十六、	婶娘赛亲妈.....	(80)
十七、	继母更比亲娘亲.....	(85)
十八、	喜夸延庆“十赡养”.....	(88)
	编后记.....	(96)

让美好心灵的鲜花开遍大地

《海坨女儿》第一集，记述了战争年代妇女的英勇斗争事迹。这是《海坨女儿》的第二集，将集中介绍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，妇女中先进模范人物的美好心灵，以教育一代新人。

在我们国家里，虽然剥削阶级已被消灭，但剥削阶级的思想还在散发着臭气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，旧风俗，旧习惯的残余，还在腐蚀着人们的思想。特别是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毒化了国风，败坏了民气，搞乱了人与人的关系，不仅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推向了灾难的深渊，还把一个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弄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而中华民族尊老爱幼，夫妇相敬的传统美德，却遭到批判。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秽谣污浊的思想乘机泛滥，严重毒害着社会风气和无知的青少年。不迅速扭转这种现象，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。

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县妇联在县委和市妇联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，在各级党委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，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以尊老爱幼，夫敬妻爱，团结互助，先人后己的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五好竞赛活动。这个活动，深得广大妇女和群众的欢迎，取得较好成绩，五好家庭大批涌现，五好个人成倍增加。1980年共评选出五好家庭431户，五好个人565人；1981年五好家庭增长到5009户，五好个人增长到6811个；1982年五好家庭达10774户，五好

个人达 11796 个。

为了促进后进户的转化工作，又利用电影《喜盈门》的上映，在全县妇女中开展了学水莲，照镜子的教育活动。仅 1981 年 6 月一个月，就为妇女包演《喜盈门》235 场，加上看电视，受教育面达 12 万人。观看后，组织大家座谈讨论，对照自己谈感想，加上妇代会干部有针对性地包户作工作，使全县妇女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。儿媳主动向公婆认错，一家分居多年重归于好，两锅并一灶，吵骂变为欢喜。在学水莲活动中，共评选出水莲式好媳妇 1942 人，转化强英式人物 370 人。五好家庭典型体现了广大人民的美好心灵，有着示范、开导、鼓舞的作用。通过一批一批地宣传他们的美好心灵和激动人心的事迹，在全县开始出现了一个尊老爱幼，夫敬妻爱，兄和弟亲，妯娌团结，姑嫂和睦的新气象。评比活动中，公公夸儿媳，儿女夸妈妈，小姑夸嫂子，大姑姐夸弟妹的场面，都十分动人。

为宣传他们的好思想，好品德，用他们的美好心灵的先进事迹教育更多的人，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妇女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，我们选用了其中的一部分编印成册，作为向中国妇女“五大”的献礼，并献给全县妇女姐妹们和广大人民，让她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开花结果。

延 庆 县 妇 联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她 的 事 业 在 田 间

在一片广阔的棉苗里，一个八、九岁的小姑娘，正跟着大人，用手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捏棉苗上的红蜘蛛。烈日当空，又闷又热，小姑娘汗水淋淋。她皱起眉头，心里嘀咕着：红蜘蛛要用手捏，棉花蚜虫要用手抹，大豆青虫要用手逮，偌大一片庄稼，什么时候才能捉完这些虫子啊！难道就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对付它们了吗？小姑娘出神地想着。

她，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李荣华。

当李荣华长成为一个大姑娘时，已是山东农学院植保系的一名大学生了。农业科学知识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神奇的世界：地球上的昆虫有上百万种，有害虫，也有益虫；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，用科学的方法可以十倍、几十倍、上百倍地提高工效，使农作物获得高产。啊，植保科学，你是怎样地造福于人类啊！李荣华立下了献身植保工作的志向。

1964年，25岁的李荣华大学毕业了。她被分配到北京，调到远郊延庆县工作。她决心用自己学到的全部专业知识为农业生产服务。

十年动乱，使她失去了几年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，进了“干校”，又被下放劳动。那些年，党政机构和技术部门都瘫痪了。她目睹着蚜虫危害高粱，造成大片枯死；粘虫危害玉米，把植株吃成光杆；钻心虫和自发病危害谷子，造成严重缺苗断垄的情况，心里难受极了。一个植保技术干部的责任感，使她再也不能继续沉默下去了。她向当时的领导提

出，一定要重视抓好植保工作，并自告奋勇去管这个事。尽管当时各方面的工作都还没有走上正轨，但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”这个道理，农民和农村干部心里是明白的，总不能饿着肚子“闹革命”。因此，李荣华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采纳。1972年，领导把她调到了县农业技术服务站负责抓植保工作。能有机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李荣华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她如同一只受了干渴的鸭子，一旦回到水中就连头带尾地都扎了进去。

地处塞外的延庆县，是一个自然条件较差，文化也比较落后的地区。农民缺少农业科学知识，直到七十年代初期，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，还大都沿用祖辈相传的老办法。上级号召用农药打虫，在一些地方硬是推广不开。农民说，我们的玉米、高粱，自古以来都不打虫，还不是都有收成吗？有的人把随着季节南北来回迁飞的粘虫称为“神虫”，说那是打不得、治不了的。后来，随着全县小麦面积的迅速扩大，粘虫的危害日趋明显，农民们才逐渐明白，不打药是不行了。但是农药要怎样使用才更有效呢？他们还摸不出个道道来。有的人是等着上级发号施令才打药；有的人则是一见虫子就打，以为只要多打药就万无一失。由于防治不及时，不得法，往往打了三、四遍，四、五遍也控制不住危害，还浪费了农药，污染了环境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李荣华一面教给农民防治的办法，一面着手建立社队病虫测报点，筹建县病虫测报站，进行全面、系统的调查研究。

一天，李荣华和农民测报员王书臣到田间查三代粘虫，刚查了三个点就下雨了，他们只好跑到村里躲雨。小王想，今天天气不好，也许不用再去了吧。没想到，雨刚停，李荣华又带着他奔向了田间。小王暗暗地想，这个师傅真不

简单哪！一个女大学生，一头钻到庄稼地里，比我们农民还干得来劲。我得好好向她学习！

岂只是王书臣一人有这样的感受！小张、小贾、小胡……他们哪一个不是经李荣华手把手地教过的啊！他们的这位“李师傅”，不但教给他们农业科学知识和植保技术，还传给了他们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。

李荣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她的爱人也是农业技术干部，常在外面跑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她没有时间在家照料，就把两个孩子都托到村子里去。在病虫发生的季节里，她经常一两个月也顾不上去看一次孩子。后来，孩子进了幼儿园，她每天都送得最早，接得最晚。有时赶上粘虫大发生，孩子病了， she 就把孩子留在家里托邻居照料，自己依然早出晚归。有一次，天没亮她就要下地了，孩子还未醒来，她把孩子锁在屋里。孩子醒来后，站在窗前，眼巴巴地盼着妈妈回来开门。孩子的爸爸回家，看到孩子焦急欲哭的样子，十分心疼。李荣华听他爱人叙述这情景，心里也十分难过，两行热泪簌簌地落下来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何尝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？但贻误了防治病虫害的时机，将会给延庆县的农业生产造成多大的损失啊！在这虫口夺粮的关键时刻，她怎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丢下工作不管呢？后来，她把老人接到身边照料孩子。每年五月中旬到八月下旬，她都是早上四、五点钟就起床，到田间的测报点上逮蛾子和了解情况，风雨无阻。在病虫发生的季节，她和男同志一道骑着自行车下乡搞调查，有时一天跑一百多里。只几年功夫，她跑遍了全县26个公社和二百多个大队。她每到一地，就把公社和大队的技术员召集到一起，和他们共同进行田间调查，耐心地向他们传授知识，还经常给他们上技术课，看到李荣华这样热

情忘我地工作，植保站的职工和各大队的技术人员都深受感动。他们以李荣华为榜样，一心扑在植保工作上。李荣华也十分注意团结同志，发挥集体的力量。在她的带领下，站里形成了一种团结友爱，遵守纪律，勤奋好学的好风气。由于植保站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，全县很快就建立起了十四、五个大队测报点，训练出了一支懂业务知识，有工作能力的技术骨干队伍，为搞好对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开展群众性的防治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李荣华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，但她从不迷信书本，也不盲从别人的经验。她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，组织植保站的同志积极地进行各种科学试验，反复摸索本地区一些主要病虫的发生规律和最佳防治方法。

1977年，北京市预报三代粘虫大发生，近郊区一些社队和与延庆相邻的河北省怀来等县，三代粘虫危害严重。情况多么紧急呵！延庆县要不要组织一次对三代粘虫的歼灭战呢？当时，邻县又来求援，要求调给一部分除虫农药。县委负责同志征求李荣华的意见。在这个时候，她的决断是举足轻重的。她想：我要做出对人民负责的回答！她和植保站的同志们反复研究，根据延庆地区的地理、气候特点和自己调查的资料分析，果断地做出了三代粘虫在延庆县不会大发生的预报，同意将敌百虫、粘虫散等农药支援邻县。结果全县三代粘虫真的没有大发生。这一年，他们既支援了邻县，又为各社队节约了大量资金和劳动力。全县的农民都很感谢植保站的同志们。

1978年，全县二代粘虫大发生，有14.1万亩土地受到威胁，李荣华和植保站的同志们提前二十多天作出了预报。在防治措施上，他们根据当年延庆地区蛾盛期长的特点，提出了

大胆的改革意见，由过去在二龄盛期打药，改为在三龄盛期打药，把防治时间推迟五至六天，高度集中人力、农药和杀虫器械，在短期内一鼓作气消灭虫害。这样，既能减少打药次数，节省开支，又能取得最好的防治效果。实践证明，她的主张是对的。这一年，只用了五、六天就防治完了14万亩，比往年少用一半时间。全县有一半以上的虫害发生面积只防治一遍就控制了危害，比往年少用了一次药，节约农药开支3.2万元。

李荣华和植保站的同志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。他们做到一虫一病一档案，季季整理，年年存档，初步摸清了几种主要病虫害的发生消长规律，因而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报，有效地指导了防治病虫害的工作。全县受害面积逐年减少，到1976年，全县已基本控制了粘虫、麦蚜和地下害虫的危害，全县农药用量降低了三分之二。近些年来，延庆县的农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，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。这其中就有植保站的一份不小的贡献。由于植保站的成绩显著，1978年被市农林局评为先进植保站，多次被评为全县的先进集体，1981年被农业部农作物病虫害测报总站评为全国先进集体。

长期的科学实践，丰富了李荣华的知识，她将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和经验。1980年，她和植保站里一位大学毕业的农业技术干部张经武，共同总结了“粘虫的预测预报”、“麦蚜的发生规律及其防治”、“超低量喷雾新技术的改进和推广”等经验。这些材料都受到了市农林局的奖励。1980年6月，李荣华以她所写的《延庆地区麦蚜发生规律及防治适期的研究》的科学论文，和她多年来在植保工作方面所作的贡献，获得了农艺师的光荣职

称。

李荣华是解放后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。她对党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感情，是在自己的具体工作中表现出来的。她说：“每当上级交给我一项具体任务时，我就很兴奋，就一定要往好里做。工作就是幸福。在我看报和看一些外国的参考资料时，总是喜欢看到外国人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怎么好，而不喜欢看到别人说我们不行。只有靠干才能争这口气。”

是的，李荣华十几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地干，热情忘我地干，这不就是她对党、对祖国、对人民的挚着的爱的具体表现吗？她渴望着自己能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但是在“唯成份论”盛行的年代里，党组织没能解决她的入党问题。然而，党并没有忘记她，而是经常关怀她，在工作上对她大力支持，在思想上给予帮助和鼓励。她在内心里也深深地感谢党，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她坚信，党组织的大门终有一天是会向她打开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即1978年8月，她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李荣华以忘我的工作 and 突出的成绩，赢得了群众的拥戴。从1973年起，她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1979年，被评为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。后来，她又先后被评为延庆县的优秀共产党员，被选为县党代会的代表、县委委员。1981年8月，被提拔为县农办副主任。今年4月，又被选为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。在这些荣誉面前，她没有陶醉，她在考虑着一个严肃的问题：我怎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重托呢？

李荣华正在四化建设的大道上，踏踏实实地奋力前进！

农科战线一金花

一、她的志愿

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”。这是陈莉同志在报考大学时，填志愿写下的誓言。这个志愿一直鼓舞着她，支持着她，使这个从小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女孩子，考进了农业大学，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，又来到了北京市的远郊——延庆县扎根、发芽、结果，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陈莉同志从小学习刻苦。中学时连续三年是班里的三好学生，又是第一批入团的优秀团员。五七年反右时，父亲被打成右派，陈莉就成了“黑五类”子女。尽管压力很大，但没有压倒她刻苦学习的决心。五八年考大学时，她毅然决然地报了农业学院。她的想法很简单：祖国的需要就是共青团员的志愿。

五年的大学生活，她如饥似渴地学习，课堂上认真听讲，认真钻研；下乡实习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并把下乡作为自己改造和锻炼的好机会，自觉自愿地到艰苦的地方，以便缩短自己和农民之间的距离。

一九六三年秋，大学毕业了，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，也就是在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，她仍然坚持一句话：“服从分配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”。六一年，她和同学曾来延庆实习了一年，延庆的艰苦条件，她是知道的，农村食堂粮不够吃，瓜菜带，每人每天只是三个二两一个的窝头。但延庆的河山，延庆人民给她的印象是美好的。

她决心在延庆广阔的土地发光发热。她向负责分配的同志表示：“我志愿去延庆”。于是她告别了父母姐弟，告别了没有离开过的城市，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塞外。

二、平凡的工作、可贵的精神

延庆贫穷落后的状况，对于一个初来的城市姑娘来说，是多么大的考验呀！但她没有把生活条件放在心上。她看到延庆贫困，就分析贫困的原因。她看到社员们一到五月就借粮，青黄不接时吃苦菜加杨树叶子。社员们一年到头，每人只有二斤白面，还不舍得吃，只是大年初一吃一顿饺子，剩下的留着待客。家里有病人找队长开个条子才给二斤社会照顾白面。这些情景，使她深深感到一个农业技术员的责任重大。她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。开始想搞玉米，学习劳模王保京，使玉米亩产 1000 斤，解决社员借粮问题。她又想搞小麦，让社员都能吃上白面。但她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，刚到延庆就参加了四清运动。她只好一面参加运动，一面抓生产，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农业生产情况，帮生产队订计划，深入田间调查研究，搜集农谚，搞小麦品比，土豆栽老根。

麦收时，她村村队去调查穗收，取样改种，了解小麦生长情况。到了秋天，不在场院里就在庄稼地里，不论是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白薯，整天量呀、数呀忙个不停。从那时起，她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记主要工作及农业活动和天气现象的流水帐，这样使她熟悉了延庆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，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“轰轰烈烈”的“史无前例”时期，不少人认为专业没用了，书本没用了，把自己的书刊笔记处理了，但她还是

把教科书和笔记保存得好好的。她总是想：运动总有不搞的时候，国家培养自己学习的专业，必然有用到的一天。

六九年，她们夫妻二人一道被分配到大柏老公社当技术员。那时她已经三十岁了，有了孩子，但对于家庭、孩子他们想的不多。他们想到这是他们出校门后正式作农业技术工作的开始，心情很激动。一到公社就急切地奔向田间。

大柏老公社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在全县来讲还是较好的。当时，公社领导很支持她们的工作。她的指导思想是：只要能促进生产就要干；干就要干好，平凡的工作要做出成绩来。八年中她参与和支持了公社农业技术上的几项重要改革。首先是以两杂制种为中心的良种化。这项工作从组织征集种子，到确定丹育6号为玉米当家品种，前后进行了三年。原来这里的“两杂”一点基础也没有。她和爱人马永青为了把工作面铺得大些，就分头出门调种。她一个人拿上钱和粮票及大大小小的口袋上路了。在平泉县，她搭乘拖拉机去城北四十里的黄土梁粮库取黄豆和灯笼黍种。一路严寒，把脸上的肌肉都冻僵了，下了车竟不会说话，但她马上就开始了工作。她虚心向外地的同行学习，走一处，问一处。从六九年到七〇年初整整冬三月，她们出去回来，回来又出去，一把把地征集，少则几粒，多则几百斤，总共有一百多样品种，上千斤粮。由于沿途勤学勤问，她由对“两杂”一无所知到初步掌握基本知识，回来就组织队伍，办班传授。为了使工作进展得快些，她们安排全公社22个大队，村村制种，队队试验，让每个村都看到杂交种的表现，让每个队的技术员都学会制种技术。她后来总结了试验、繁育、制种三步法，一年后全社普遍掌握技术，制出的种子第二年就向外调出了。玉米当家品种丹育6号的采用比全县还早了一年。

第二项重要改革就是“双成畦带种法”的总结和推广。改革是生产发展提出的新课题。七十年代的冬小麦已在大柏老公社普遍种植，但种植方式一直没有解决，套用北京近郊的大小垄种法，套种一行玉米，玉米苗长在窄窄的背上受欺。延庆无霜期又短，常常不能成熟。这样小麦套玉米产量极低，形成两茬不如一茬，致使小麦面积不能保证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公社党委给技术员提出要求：找出一个适合延庆条件的种植方法。但谈何容易！开始，陈莉和她爱人组织全社技术员到平谷许家务学习“三密一稀”的种法。回来全面推广，搞了一年，小麦产量显著上升，但玉米仍夹在窄窄的埂上受欺。根本问题没有解决，她们又采用汤鹿的带状种植，把一行玉米改为两行，把一尺多宽的埂改为三尺多宽的畦，大大改善了玉米的生长条件。改革是件麻烦事，开始群众往往不认识，嫌麻烦，她们就分开在三个大队七个生产队试验，一年里抓出了三个成功的典型。最后集中在一个村进行总结，市里来的专家和新调来的领导对这种种法开始也都表示怀疑，尤其是有位颇有名望的小麦专家认为，这是迁就延庆耕作粗放的作法。对于这种批评，陈莉没有接受。她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就是要因地制宜。在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，经过她和许多同志的努力，这个种法终于站住了脚。她采用一位老农的说法，给它起名为“双成畦带种法”。这种种法，玉米产量和平播的一样高，小麦产量也不低，两茬加起来超过八百斤，“两茬不如一茬”的问题解决了，以玉米保小麦，小麦种植有了保证，全社立即开始全面推广，一下子就是七千多亩，七五年全县普及了这种种法。

基层的农业技术工作平凡而琐碎，不见得能搞出什么名堂，但是，它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对这项工作，陈

莉一直牢记着她一位老同学的话：“平凡的措施，一丝不苟的贯彻”。多年来，她就是遵循这个原则，默默地做着大量的不起眼的工作。比如推广玉米的密植，她先从查现状入手，算细帐，定标准，然后开现场会，布置技术要求，开完会还要亲自下去检查，用尺子量，手把手一个人一个人地纠正，自己不能嫌烦，更不能怕别人烦，这样才能把这项普普通通的技术贯彻下去。再如，预测和防治二代粘虫工作，虽有植保站的准确预报，但为了解决本地的问题，她仍坚持每年亲自检查，在查蛾，防治期间村村跑遍，督促打药，检查药效，还要组织打药器械的维修。这项工作每年总得到这代幼虫化了蛹才能把心放下来。

三、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工作上

在基层做技术工作是艰苦的，尤其是女同志，难处更多。她东奔西跑，起早睡晚，不怕风吹日晒，酷暑严寒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一直坚持在基层干了八年。近几年，就在她搞小麦新品种选育时，每年一到五、六月间，每天清晨，她都淌着露水下地，观察记载，脚下湿得直流水，下半身的衣服全浸透了。衣服刚干一点，到中午十一、二点钟，就在太阳光下看材料，因为太阳光直射着材料不晃眼，看得清楚精确。大夏天，是蚊蝇滋生时节，庄稼地里蚊子很多，她整天在庄稼地里忙。白天她的手脚被蚊子咬成一片片的大疙瘩。晚上不知不觉又消散了。天天如此，她没叫过一次苦。

一个女同志在基层推广技术工作困难是多种多样的。首先，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中还存在着，有人说：“一个女的能搞出什么来？农民种了一辈子地，还不如

城里来的女学生？”同事中也有人说：“你是兔子尾巴长不了！”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，她从来也不生气，不激动，正视自己的弱点，虚心向老技术员学习，以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虽是女的，也可以成为合格的农业技术员。由于工作需要，必须得正确处理家庭、孩子问题。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奶母带大的，都是在农村长大。大孩子是她产假刚满时就送到奶母家，六周岁才接回来又送到奶奶身旁。二孩子生下时，正值三秋种麦时节，孩子刚刚四十天就送到奶母家，七周岁才接回来。她并不是不想孩子，由于工作忙，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等到工作不太忙了，或放假的时候，才去奶母家看孩子。这样整十年，真不容易。

别看她已有两个孩子了，但他们多年来都没有个正经家，七八年前他们只有一间十一平米的小南屋，那只是他们夫妻回县开会，或去北京探亲时落脚的地方。家里只有一个小炕桌，两个小方凳，一口小缸，什么新式家具，或成套摆设，她连想都没时间去想，更别提去购买制作了。

她全家五口人，现在也分居两地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还有在农村的亲属，经济上并不宽裕，她从经济上先安顿好老人和孩子，保证他们的健康，好让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。她为改变延庆面貌，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，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和公社党委的重视，七五年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从此，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认为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决心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提高一步，为农业生产的发展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四、新的起步

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八年，因工作需要，把她调到县农

科所工作，分配她搞春麦育种，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多年来她一直盼望着自己能亲手培育品种，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新的工作对于她这个近四十岁的人来说，确实不容易。因为她在学校学的是农学，不是育种，在十多年的工作中也是以全面搞生产为主，边工作边实验，而育种则是非常细致的工作。她先用常规育种的基本程序和操作方法，在十来亩地的实验田里种了上千个实验品种。她精心管理，细致观察，整个实验田观察一次得用两三天时间，一天到晚在地里站着、看着、记着、想着、比较着。刚开始站两三个钟头就腰酸腿疼，她硬是咬牙坚持着。在准备春播品种时，她挨个数麦粒，一数一个星期，得数上千份，数过装袋、编号，一丝不苟。

七八年领导决定让她到北京农科院学习，她认真学习，虚心请教，主动与课题主持人配合，在田间、场上，组织那里的工人收打脱粒改种。为了尽快熟悉材料，她每天早上班一小时，吃完饭又继续下地，一直到太阳落山眼前模糊才回来，晚上又在灯下查阅资料。通过实习期间的认真学习，她又熟悉了农科院移交延庆的全部春麦材料，也学会了常规育种的正规操作方法。

三中全会以后，基层农业技术工作以推广为主，以引种为主，直接为生产服务。根据这个精神，她组织育种组的技术人员重新摸索工作方法，并和许多科研单位挂了钩。经过三年的努力，找到了适合延庆生产的新路子和新方法。育种组在谷子、冬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大豆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，她组织的春麦组选育的春麦新品种“八〇签十四”已开始推广。

陈莉同志并不满足眼前已取得的成绩，她正不停地研究、实验。今后打算搞春小麦新品种选育，并发挥育种组全体